

怕老伴“踹” 古稀老汉“换脸”



俄一位已经年过古稀的退休老汉,为了留住比自己小17岁的老伴,决定通过整容让自己变得年轻。然而结果出人意料,老伴最终还是离他而去,但是他近日又找到了新的红颜知己。

米哈伊尔·瓦西里耶夫今年73岁,是克拉斯诺亚尔斯克的一位退休工人。他在给医生的求助信中写道:“老伴就要抛弃我了,而我是如此地爱她!我是个退休工人,没什么钱,求你们免费帮我去除皱,就当是一次试验吧。只要能让我变得光滑,你们对我做什么都行。”

当地医院决定帮助他。医院外科主任奥丽佳·格鲁舍夫斯卡娅回忆说:“那天我走进总医师的办公室,看见一位老爷爷双膝跪地……这场面让我们不敢面对他。”

米哈伊尔的妻子伊拉虽然已经50多岁,但仍然显得年轻漂亮;而米哈伊尔刚过70,就一下子老了起来,脸上布满皱纹。伊拉开出条件:要么整容,要么离婚。手术虽然没让米哈伊尔返老还童,但是毕竟让他不再显得太老。然而,这并没有留住伊拉的心,她还是离开了他。

不过,这并没有让米哈伊尔苦闷多久。换了新面孔的他,很快就迎来了第二春。他先是找了一份看门的工作,后来结识了70岁的因娜·伊万诺夫娜,两人很快坠入爱河。因娜告诉记者,爱上米哈伊尔不是因为他的外表,而是因为他有美好的心灵…… 邱永峥

大旅行箱充当钱包 数钱数得拇指抽筋

我在津巴布韦当“百万富翁”

▶▶▶ 域外

人人都是“百万富翁”,已成为通货膨胀率达1042%的津巴布韦的一个独特景观。

大旅行包当钱包

“在津巴布韦,如果不带个数百万,你都不好意思出门。”这是朋友的一句玩笑话,却准确地概括了津巴布韦通货膨胀的景象。在津巴布韦,停车给小费就得数万津元,买条面包要花12万,一袋牛奶11.5万。与我相熟的书店店员赛拉斯说,现在人人工资都过百万,可是500毫升的果汁要40万,一卷手纸也要15万。

带现金出门成了麻烦,来津巴布韦的头一天,我在北京用的钱包就被雪藏起来,而那儿的汇率只是1美元换几千津



元。我的前任临走时,很慷慨地把她的化妆包给我作钱包用,并传授经验说,用国内寄报纸的大信封装钱更方便。

不过两年,汇率攀升到1美元换10万津元,出门要用又大又结实的书包装钱,买大件东西就得钱箱伺候了。一个朋友去买洗衣机,背了1亿津元

进商场,洗衣机还没买,肩膀已被钱压得生疼。我和同事去买电脑,着实为如何装那数亿津元伤脑筋,最后我把行李箱找出来装钱,当钱交给电脑公司后,我真切地体会到什么叫“如释重负”。

该出手时就出手

朋友常叮嘱我,在津巴布韦买东西,该出手时就出手,因为价格涨得太快了。4月初我买一袋大米是300多万,一个多月后价格已超过900万。我

看上了一双皮鞋,37.5万时没买,而我买下来时已是350万。渐渐地,我和别人一样学会一次性购买多瓶烹饪油、数袋面粉和几包盐,并在价格上涨后窃喜。

津巴布韦的商家们,特别是那些卖大宗电器的商家们也有自己应对贬值的方法,他们往往只在一件商品卖完后才会再进下一件同类商品,所以你会发现店里展示的都是孤品,等它卖掉了,新进货品的价格也就涨上去了。

数钱数得头晕眼花

通货膨胀中的另一个烦恼就是数钱。如今的津巴布韦,9人吃饭要花三四千万津元,结账时,一沓沓钞票数下来,让人眼花头胀,大拇指直抽筋。一次,我跟两个从国内来的朋友

吃饭,为了避免先抢付钱的尴尬,大家决定,谁能先把钱点好谁就赢得结账权。

每次去超市,办事规矩的当地收银员接过钱后,总要先把钱按正反两面一张张理好,然后再10张一沓码好,最后还要把每100万用皮筋扎好,这个过程要持续10分钟到半小时。更麻烦的是交电话费,近几个月来,由于电话费涨价,特别是国际长途和拨号上网费涨价,我和同事每人每月的电话费达数千万津元,收银员点起来要1小时。

于是,点钞机成了津巴布韦最紧俏的商品之一,但价格贵得惊人,从3.5亿到12亿不等。当新同事从北京带来一个点钞机时,我们庆幸终于可以告别手工点钱的痛苦了。 江云

苏俄领导人引领着装新时尚——赫鲁晓夫爱穿花衬衣

▶▶▶ 揭秘



列宁帽至今有人追捧

从苏联开国元勋列宁、斯大林,到“解冻”和停滞时期的赫鲁晓夫、勃列日涅夫,再到改革阶段的戈尔巴乔夫和俄罗斯独立后的叶利钦、普京,苏俄领导人不但掌握着国家前进的方向,同时也引领着政治精英和普通民众的穿戴时尚。那么,他们在着装方面都有什么与众不同之处?

列宁: 便帽至今有人追捧

列宁的着装是“无产阶级式”的——简单的西装上衣、一成不变的坎肩和招牌式的便帽。这种便帽后来成为布尔什维克胜利的象征,并且引领了当时的社会时尚。

在列宁去世几十年后的当代俄罗斯,便帽早已不再是政治精英的时尚选择。不过,有一位“政坛大佬”还是对它情有独钟,那就是“莫斯科之王”卢日科夫。他的便帽种类繁多,花样无穷;有运动式的、有皮的、有毛的……由于“藏品”实在太多,摆在家里甚至都显拥挤,因此他有时不得不把帽子寄存起来。

斯大林: 高官跟着穿军装

斯大林一生与战斗紧密相连,这也造就了他对军装的喜爱,而红星大沿帽和翻领元帅服,为他增添了更多威严。斯大林最喜欢穿的是带四个兜的窄腰身英国弗伦奇式军上衣和高筒靴,而这几乎成了所有党政领导人的制式服装。

赫鲁晓夫: 礼帽曾引领时尚

赫鲁晓夫上台后,政治“解冻”导致了苏联党政领导层在着装上的变化,军装被便服所取代。赫鲁晓夫本人喜欢宽松的短大衣和色彩明亮的西服上

衣。由于身材并不算很标准,因此他的上衣、衬衣、皮鞋都需要专门订做。

赫鲁晓夫也追求着装的亲民化。例如,他有时会穿着绣花衬衣出现在公众场合。为了与国家领导人保持一致,有些党政官员也不得不向他看齐。赫鲁晓夫在着装上的另外一项“革命”,是在夏天和秋季戴礼帽,这很快也成为了一种时尚。

勃列日涅夫: 第一个戴上太阳镜

勃列日涅夫的衣着均由传奇设计师亚历山大·伊格曼德“包装”。值得一提的是,这位苏联领导人在衣着方面很保守,从不改变习惯去追赶世界潮流。

例如,他的西服上衣一定要有三个或者四个扣子,而且无论设计师怎么建议为他缝制当时世界流行的双排扣上衣,他都坚决不予同意;此外,他最喜欢的衬衣颜色是浅蓝色,领带只要进口货,而且领带不是系的,而是扣的,目的是为了不勒脖子。

勃列日涅夫还喜欢休闲装,而且休息和度假时总要认真准备,选择与活动相配的服装。他还是苏联领导人中第一个戴太阳镜的人。

叶利钦: 第一个穿上晚礼服

叶利钦是俄罗斯领导人中第一位穿晚礼服的人。尽管起初他也和许多前辈一样,对这种服装抱有排斥态度。但是,他最终被说服了。他第一次穿晚礼服是在1994年,目的是在克里姆林宫迎接来访的英国女王。此后,他还在对美、日的正式访问中穿过这种服装。尽管如此,叶利钦还从未穿过燕尾服。

普京: 手表戴在右手

总体来说,普京的外部形象无可指摘,他的正装总是非常严谨而又得体,西服总是掐腰、微长;衣服永远是同一色调——冬季是黑色,夏季是浅色。

在非正式场合,普京喜欢穿黑色紧身高领套头衫,还曾穿过浅蓝色牛仔服。对于他来说,最具标志性、最受追捧的打扮是把手表戴到了右手上。在他之后,这种异乎寻常的时尚开始在俄官员中流行。 (摘自《深圳特区报》)

两换心脏 一月三逃死地

最近,美国宾夕法尼亚州安姆伯勒市身患重病的46岁男子盖里·奥努弗在一个月时间中连换了两颗“心脏”,奇迹般地存活了下来!

今年2月1日,盖里突然遭遇心脏衰竭,呼吸困难的他被送到了费城的宾夕法尼亚大学医院接受抢救,惟一能够拯救盖里的办法,就是尽快为他实施心脏移植手术。对于大多数心脏移植病人来说,在等待合适的捐赠心脏出现前,医生会先在他们衰竭的心脏中植入一个设备,帮助这颗心脏继续工作。然而盖里的心脏太过虚弱,即使通过仪器帮助,也无法维持两个月时间。

专家们决定先为盖里移植一个先锋性的“完全人造心脏”,然而美国东北部地区的医院此前从来没有为病人移植过这种人造“心脏”。在全世界范



盖里(左)

围内也只有15家医院做过这种“人造心脏”移植手术。由于风险很大,医生询问盖里是否愿意先临时移植这种“人造心脏”,等捐赠心脏出现后,再用捐赠心脏换掉这颗“人造心脏”。盖里立即答应了,否则只有慢慢等死。

2月12日,医生通过6小时的手术,为盖里移除了胸中那颗衰竭的旧心脏,换上了那颗“完全人造心脏”。换上人造心脏后,尽管盖里仍然需要呆在医院中,但他却能够下床锻炼了。由于盖里体内的“人造心脏”工作得非常棒,所以医生可以拥有更充足的时间为他寻找一颗最适合的捐赠者心脏。但仅仅28天后,医生们就为他找到了一颗合适的捐赠者心脏。3月11日,专家再次为盖里实施了心脏移植手术,用捐赠者心脏取代了“完全人造心脏”。11天后,盖里的胸中装着第三颗心脏出院回了家。当他在妻子琼和医生护士的陪伴下慢慢走出医院大门时,他对记者称,他感到自己充满了力量,简直可以参加三项全能竞赛了。 志文

长征,女红军付出哪些代价?

▶▶▶ 往事

两万五千里长征,关键在于行,但除了走路,女性同男性一样,还要面对人类最基本的需求:吃饭、穿衣、睡觉等等。这些女性她们是如何解决这些问题的呢?

●行军速度慢

参加中央红军长征的女性,准备时间并不充裕。在一些女性的印象中,来不及做什么准备就匆匆出发了。

她们每人带7-5公斤的东西,其中包括2.5公斤粮食。所有的东西被打成一个背包,外加一个挎包,里边装着几件换洗的衣服和简单的日用品,每个人的腰带上还挂了一个搪瓷缸,走起路来叮当作响。虽然她们与男红军相比,随身带的东西不算多,但她们的行军速度慢,依然达不到要求。

●坚决“不得8块钱”

女红军的行军队伍分了又



长征中的女红军

合,合了又分,人们更关注的是,她们如何在恶劣的条件下生存下去。邓六金长征到贵州时患了痢疾,两天不到就走不动路了。领导劝她留在老乡家养病,她坚决地说:“哪怕是死,也要死在队伍里!”

当时有“8块钱”之说,实在走不动的伤员,按规定给8块光洋寄养在当地老百姓家里,但后果往往是被杀被抓,或因伤病得不到治疗而死,因此,

女红军的行军口号朴素而简单:“不掉队,不帶花,不当俘虏,不得8块钱”。

●最头痛来例假

在行军途中,女红军的衣食住行几乎都是原始标准。阴雨天被淋得像落汤鸡,在严重缺水地区脸上又常蒙着一层灰尘。恶劣的条件使得女红军的性别意识淡化。她们最头痛的是来例假。当时在敌人的尾追下部队不停地赶路,尽管腹部绞痛,两腿发抖,但捂着肚子也得一步一步往前挪。住宿时,三五个人挤在一起,还要躺在潮湿的土地上。女红军危秀英居然练出了站着睡觉的本事。

●“三寸金莲”过雪山

四方面军担任妇女运输连连的王泽南,是一位裹着小脚走路的女性。在过雪山的时候,她曾唱过这样一首歌来鼓励其他红军战士:“裹脚要用布和棕,包得不紧又不松,到了山顶莫停留,革命道路不能停。”最后,她硬是凭着“三寸金莲”征服了千山万水。

●女性在“牛粪里刨食”

她们为了生存,甚至从牛粪堆里拣粮食吃。女红军钟月林、钱希钧和谢飞三人在一家藏民宅子里嚼着苦涩的野菜,细心的谢飞发现楼下牛粪堆里夹杂着一一些没有消化掉的麦粒,起初她们还有点嫌脏,但饥饿的滋味更可怕。她们顾不上牛粪上还爬着蛆虫,开始拣麦粒,很快就拣了两三斤。她们把麦粒拿到河边仔细洗干净,然后放到锅里去炒,金黄的麦粒就变成了美味的食品。过草地的时候,一位男性红军指挥员曾经提出要用半块香皂来换谢飞手中的一把熟麦粒,谢飞没有换,而是白送了他一把。

“她们几乎什么都吃过,茴茴草、松菌、清水煮树皮、草根、皮帽。有一次,她们把萝卜奇采来的野烟叶子当成萝卜缨子,吃掉后差点中毒。” (摘自《合肥晚报》)